

“五育并举”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渊源与实践意蕴

李可云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1日

摘要

“五育并举”的理论根基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存在深层逻辑关联。研究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劳动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研究发现,“五育并举”在价值目标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在内容维度上实现了经典理论的具体化。同时,研究引入张力分析视角,揭示了“五育并举”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四重现实挑战。基于理论分析与现实诊断,研究从融合育人体系构建、课程教学优化、综合评价机制完善、条件保障健全四个维度提出系统化的实践路径。“五育并举”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在继承精髓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时代创新,它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探索人的相对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

五育并举, 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The Marxist Anthropological Origi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Educating Five Domains Simultaneously”

Keyun Li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pril 9, 2026; accepted: June 2, 2026; published: June 11, 2026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ducating Five Domains Simultaneously” shares a deep logical

文章引用: 李可云. “五育并举”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渊源与实践意蕴[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6): 190-198.

DOI: 10.12677/ve.2026.156261

connection with the Marxist doctrine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Grounded in Marxist classic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core tenets of the theory of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from three dimensions: labor capacity, social relations, and free individua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Educating Five Domains Simultaneously” inherits the ideal pursuit of Marxist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value goals, while concretizing classical theory in terms of content dimensions. At the same time, introducing a tension analysis perspective, the study reveals four practical challenges confron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ng Five Domains Simultaneously.”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diagnosis, the study proposes systematic practical pathway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education system, optimiz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supporting conditions. “Educating Five Domains Simultaneously” is not a simplistic application of Marxist theory but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built upon the essence of Marxist thought. It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v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Developing Five Types of Education Simultaneously,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1]，强调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切实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唯顽瘴痼疾。这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五育并举”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对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尽管“五育并举”已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明确方向，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唯分数论和应试教育倾向尚未根本扭转，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2]。另一方面，对“五育并举”的理解存在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或将“五育”割裂为相互独立的部分，缺乏对其内在有机联系的深入把握；或将其简化为课程与课时的增减，未能从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度进行系统变革。这些实践偏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五育并举”理论根基的认识不足，特别是其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阐释。因此，亟需从理论源头厘清“五育并举”的思想内涵与价值取向，为实践提供清晰的方向指引。

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与中国教育实践的关系，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理论阐释层面，有学者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思想演进脉络，揭示其从哲学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转向[3]；也有学者聚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命题，探讨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内涵与新形态[4]。在政策研究层面，自“五育并举”提出以来，研究者从教育政策学、课程与教学论等视角对其内涵、实施路径及评价机制进行了

探讨, 产出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关怀的成果[5][6]。然而, 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 一是对“五育并举”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多为宏观论断, 缺乏从文本细读出发的系统论证; 二是对“五育并举”实践中面临的深层矛盾与张力关注不足, 批判性分析相对薄弱。本研究尝试在这两方面有所推进: 一方面, 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从劳动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五育”各维度的理论根基; 另一方面, 引入张力视角, 分析“五育并举”在现实推进中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以期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野。

2.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阐释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这一理论首先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状态的深刻批判之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 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7]这种异化劳动使得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正是基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 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8]此后, 在《资本论》等著作中, 马克思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明确指出未来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这些经典论述为我们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源泉。

(一) 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表现为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指出: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 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9], p. 195)这表明劳动能力是体力和智力的统一。然而, 在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 工人被迫长期从事某种局部操作, 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马克思理想中全面发展的人, 是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 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个人。正如他所言: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这就要求“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分人。”([9], p. 198)这种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 不仅包括体力与智力的协调发展, 也包括生产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的综合发展, 使人真正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二) 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 个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指出人的发展要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10], pp. 107-108)。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人的社会关系是简单而狭隘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 虽然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 但又陷入了对物的依赖;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 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 意味着个人能够突破地域、民族和职业的局限, 形成普遍的社会交往, 在丰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和需求, 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

(三) 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

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1]这种自由发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发展。它首先表现为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和发展方向，而不是被迫屈从于强制性的分工。其次，它表现为个人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即个人能够自觉地驾驭自己的活动和社会关系，成为自然、社会 and 自身的主人。最后，它表现为个人独特性的充分展现，每个人都能发展自己独特的才能和个性，而不是被模式化、标准化。这种自由个性的发展，既以劳动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丰富为基础，又是它们的最终归宿，体现了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而且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工厂法的考察，看到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明确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9], p. 487)这一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促进智力与体力的统一发展。生产劳动为智力发展提供实践基础，教育为生产劳动提供理论指导，二者相结合能够克服体脑分离的弊端。其次，这一结合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使教育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生产的需要，避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最后，这一结合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发展的机会，打破了阶级特权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 9 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 ([10], p. 269)。当代中国推行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特别是加强劳动教育的举措，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 新时代“五育并举”的内涵与要求

“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深化过程。早在 1957 年，我国明确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改革开放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培养目标得以确立。199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12]首次将美育纳入教育方针，提出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进入新时代，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 [13]首次将“劳育”与其他四育并列，明确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2019 年，《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14]进一步将坚持全面发展作为基本理念，强调“五育并举”的具体实施路径。

(一) 德育为先

德育旨在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是“五育”之魂。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明确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15]德育包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多个维度。德育应该通过欣赏型德育等模式，让学生在对道德之美的欣赏中实现价值认同和品格升华 [16]，不仅要体现在思想政治课程中，更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二) 智育为重

智育是传授系统科学文化知识、发展学生认知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教育活动。新时代智育强调从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改革要求智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这要求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同时，智育要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信息时代，智育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数字化生存能力，使其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

(三) 体育为基

体育旨在增强学生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培养意志品质。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体育不仅包括基本的体育运动技能训练和体质健康促进，还包含健康生活方式教育、体育精神培养和运动习惯养成。研究表明，适度的体育锻炼能够促进大脑发育，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规则意识[17]。学校体育要建立健康知识 + 基本运动技能 + 专项运动技能的教学模式，保障学生每天校内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完善健康知识 + 基本运动技能 + 专项运动技能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

(四) 美育为要

美育是提升学生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教育，能够促进左右脑协调发展，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18]，强调“美育能够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美育包括艺术课程学习、艺术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旨在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美育不是简单的艺术技能培训，而是通过审美体验和艺术实践，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和人文素养。

(五) 劳育为荣

劳动教育是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活动，适当的劳动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19]指出，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劳育包含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个方面，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必备的劳动能力、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以及积极的劳动精神。劳育要注重实践体验，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4. “五育并举”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承继与彰显

“五育并举”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都致力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8], p. 89)这一理想目标在新时代中国教育实践中具体化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核心要义，是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两者都反对片面、畸形的发展模式，追求人的各项能力和素质的和谐统一发展；都强调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既注重个人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又要求个人价值在社会价值中得以实现；都致力于打破旧式分工对人的发展的束缚，为每个人提供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机会。这种价值目标的统一性，使“五育并举”成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新时代的最佳实践载体。

(一) “五育并举”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对应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德育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理论具体化，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培养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他人关系的能力，丰富和提升学生的社会性本质。新时代德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和合作意识，这正是对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现实践行。智育对应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劳动能力全面发展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需要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人。”([9], p. 561)智育通过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授和创新能力培养，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未来从事多种社会职能奠定基础。智育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

能力,使其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体育和美育共同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 p. 530)体育增强体质、锤炼意志;美育陶冶情操、提升审美素养,是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劳育直接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技能和劳动精神,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实现知行合一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关键环节。

(二) “五育并举”的时代特色与创新意义

“五育并举”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更在新时代条件下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创新精神。首先,它回应了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体现了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其次,“五育并举”创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通过建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将宏观理论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具体教育实践。“五育并举”构建了更加系统、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实践框架。再次,“五育并举”体现了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把握。它强调五育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反对片面化和割裂化的发展模式。五育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它们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育人体系。最后,“五育并举”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它既吸收世界先进教育理念,又扎根中国大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五育并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创新,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 “五育并举”的内在张力与现实挑战

“五育并举”作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在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正视这些张力,有助于深化对政策内在逻辑的理解,也有助于在实践中避免简单化、形式化的偏差。

第一,全面发展理想与社会分工现实之间的张力。马克思所设想的全面发展,以消灭旧式分工、个人能够“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为前提。然而,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分工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领域呈现精细化、专业化趋势。这意味着“五育并举”所追求的全面发展,并非要求每个个体都成为通才,而是在承认专业化发展必要性的前提下,谋求人的各项基本素质的协调发展。如何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条件下实现人的相对全面发展,是“五育并举”必须回应的深层命题。第二,五育目标与升学评价机制之间的张力。当前,尽管教育评价改革持续推进,但中考、高考等高利害考试仍以智育为主要评价维度。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学校、家长和学生面临现实的选择压力,德、体、美、劳四育容易被工具化,体育为中考加分而练,美育为综合素质评价而学,劳育沦为拍照打卡式的形式主义。这种张力表明,“五育并举”的全面落实有赖于评价机制的深层变革,而评价改革的滞后性恰恰构成了政策推进的现实瓶颈[20]。第三,统一要求与个体差异之间的张力。“五育并举”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提出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统一要求。然而,学生在禀赋、兴趣、特长方面存在客观差异。如何既确保每个学生获得五育的基本发展,又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避免“全面发展”异化为“平均发展”或“削峰填谷”,是教育实践必须审慎处理的平衡问题[21]。第四,资源供给与实施条件之间的张力。体育、美育和劳育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应的师资、场地、器材和经费保障。然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客观存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学校,音体美专业教师短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匮乏等问题尤为突出[22]。如果忽视资源条件的差异而强行推进统一的“五育并举”要求,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甚至加剧教育不公。这

要求在政策设计中更加注重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而非“一刀切”式推进。

正视上述张力，并不意味着对“五育并举”方向的质疑，而是要在承认矛盾、分析矛盾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务实、更具韧性的推进策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启示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唯有直面“五育并举”实施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与现实挑战，才能使这一教育方针在动态调整中不断趋近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5. “五育并举”的实践路径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当前，“五育并举”在实践推进中面临的割裂化、标签化、形式化等问题，亟需从理论自觉走向实践自觉，构建系统化的实施路径。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现实诊断，研究从育人体系、课程教学、评价机制和保障条件四个维度提出实践路径。

（一）构建融合贯通的五育育人体系

破解“五育”割裂问题的关键在于树立融合育人理念，实现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的范式转换。第一，建立五育协同工作机制。学校层面应成立五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德育、教学、体育、艺术、劳动教育等职能部门，打破部门壁垒，形成育人合力[23]。改变德育处管德育、教导处管智育、体艺处管体育美育的条块分割状态，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共享、联合教研的工作机制。第二，推进跨学科主题教学[24]。在课程实施层面，积极探索以综合主题统整五育内容的教学模式。如以“生态文明”为主题，融合道德与法治课的环境伦理教育、科学课的生态知识学习、美术课的自然审美创作、劳动课的校园绿化实践、体育课的户外体能锻炼，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获得多方面素养的协同发展。有条件的学校可借鉴项目式学习的理念，设计涵盖五育目标的跨学科项目，引导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全面发展。第三，促进五育在校园文化中融合渗透。校园文化具有隐性的育人功能。应将五育理念融入校园环境设计、制度建设和文化活动之中。通过劳动实践基地与美育空间的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劳动中感受创造之美；通过体育竞赛与德育主题的融合，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与团队精神；通过书香校园建设促进智育与德育、美育的交融。

（二）优化五育融通的课程与教学实施

课程是育人的核心载体。“五育并举”的落地需要课程结构、教学方式和师资配置的系统优化。第一，完善五育课程结构。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开齐开足开好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杜绝挤占挪用现象。在此基础上，鼓励学校基于办学传统和资源优势，开发体现五育融合的校本课程。第二，深化课堂教学方式变革。推动学科教学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型。智育课堂应加强探究式、体验式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体育课堂应注重运动兴趣激发与习惯养成，避免单纯的技能训练和体能测试导向；美育课堂应强化审美体验与创意实践，警惕考级化、技能化倾向；劳动教育应坚持“出力流汗”与“手脑并用”相结合，防止有劳动无教育或有教育无劳动。第三，加强五育师资队伍建设。针对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教师结构性短缺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加大专业教师招聘和培养力度，另一方面探索区域内的教师走教、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全体教师的五育融合素养培训，使学科教师具备挖掘本学科五育元素的能力。

（三）完善五育并举的综合评价机制

评价是教育实践的“指挥棒”。建立与五育并举相适应的评价体系，是确保政策落地的关键制度保障。第一，构建五育并举的学生发展评价框架。改变以纸笔测试成绩为核心的评价模式，建立涵盖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的发展性评价指标体系。德育维度关注理想信念、社会责任、道德行为等核心素养；智育维度兼顾学业水平与思维品质、学习能力；体育维度综合考察体质健康、运动技能、锻炼习惯和体育精神；美育维度评估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方面的素养；劳育维度考察劳动观念、劳动技能、

劳动习惯和劳动精神。评价应注重过程性记录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量指标与定性描述相补充。第二,创新多元评价方式。推广成长档案袋评价,系统记录学生在五育各领域的学习过程与发展轨迹。运用表现性评价,通过真实情境中的任务完成情况考察学生的综合素养[25]。探索信息技术赋能评价,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学生发展状况进行伴随式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提升评价的科学性和精准度。第三,深化高利害考试改革。加快推进中考、高考内容与形式改革,逐步增加对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素养的考查比重,探索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纳入招生录取参考。值得注意的是,评价改革的推进应稳妥审慎,充分考虑改革的公平性、可操作性和社会接受度,避免“一刀切”和“运动式”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

(四) 健全五育并举的条件保障机制

“五育并举”的落实离不开资源、制度和社会的协同支持。第一,加大资源配置的倾斜力度。各级政府应将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设施设备纳入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设立专项经费保障五育课程实施。建立城乡、区域教育资源统筹机制,通过集团化办学、教育共同体等形式,推动优质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资源共享。第二,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家庭是劳动教育、体育习惯养成的重要场所,社会场馆、企业、社区是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广阔课堂。学校应主动引导家长树立全面发展的育人观念,改变“唯分数”的教育焦虑[26]。充分利用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企业车间、农业园区等社会资源,拓展校外实践基地,构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一体化的五育实施网络。第三,强化督导评估与激励约束。将五育实施情况纳入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和对学校的督导评估指标体系,对挤占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同时,对在五育并举实践中取得突出成效的地区、学校和个人予以表彰激励,发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

6. 结论

“五育并举”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的制度化表达与实践探索。本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发,系统考察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劳动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三个维度的核心要义,分析了“五育并举”对这一理论的继承、转化与发展,揭示了二者在价值目标、内容维度上的内在逻辑关联。研究表明,“五育并举”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套用,而是在继承理论精髓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它既回应了新时代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又在承认现实条件制约的前提下探索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路径。

同时,研究也指出“五育并举”在实践中面临全面发展理想与社会分工现实之间、五育目标与升学评价机制之间、统一要求与个体差异之间、资源供给与实施条件之间的多重张力。这些张力的存在提示人们,推进“五育并举”既需要坚定的理论自觉与政策定力,也需要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与改革智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五育融合的课程开发与教学策略、智能化时代的评价方式创新、不同区域与类型学校的差异化推进模式等议题,以不断丰富和深化对这一重大教育命题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 2020-10-13.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494381.html, 2026-03-01.
- [2] 顾明远. 再论教育本质和教育价值观——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J]. 教育研究, 2018, 39(5): 4-8.
- [3] 吴焕新. 劳动创造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马克思思想史的一个考察[J]. 探索, 2003(6): 137-140.
- [4] 刘伟兵. 作为未来教育的劳动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4(6): 62-71.
- [5] 岳志强. 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 教育考试内容改革的理据、框架与实践[J]. 教育与考试, 2025(6): 16-21, 36.

- [6] 郝志军, 郑红娜. 五育融合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 人民教育, 2025(22): 6-10.
- [7]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47.
- [8]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92.
- [9]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87.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107-108, 269.
- [11] 王红.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以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为视角[J]. 广东社会科学, 2018(3): 18-22.
- [1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EB/OL]. 1999-06-13.
https://www.nmg.gov.cn/zwgk/zfgb/1999n_5236/199907/199906/t19990613_309013.html, 2026-03-01.
- [13] 孙洁, 闫民, 武冬, 等. 新时代高校武术课程高质量发展探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026(2): 103-110.
- [14]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EB/OL]. 2019-02-2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2026-03-01.
- [15] 侯帅. 教育家精神引领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53(3): 150-156.
- [16] 檀传宝. 德育形态的历史演进与现实价值[J]. 教育研究, 2014, 35(6): 25-32.
- [17] 季浏.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的思考与构建[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9): 72-80.
- [1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 2020-10-15.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5_494794.html, 2026-03-01.
- [19]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EB/OL]. 2020-03-20.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03/t20200326_435127.html, 2026-03-01.
- [20] 徐芬. 职业院校“五育并举”与学生综合素养评价机制的融合实践研究——以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无锡办学点为例[J]. 河南开放大学学报, 2025, 38(4): 30-34, 57.
- [21] 孙佳, 童名文, 付卫东, 等. “三个课堂”撬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理性回归与渐进实践[J]. 电化教育研究, 2025, 46(3): 56-63.
- [22] 张继梅. 创新新建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新模式[J]. 继续教育研究, 2009(10): 143-145.
- [23] 张翔. 中国“政府部际协调”研究: 论域结构、范式转型与研究展望[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2): 51-58.
- [24] 许晓芳. 三维螺旋式跨学科主题学习[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6(3): 34-37.
- [25] 顾金玲, 于洋. 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的生成与实现[J]. 教育科学探索, 2026, 44(1): 89-97.
- [26] 原克学, 袁丹. 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区域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现实困境及突破策略[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6, 46(5): 16-21.